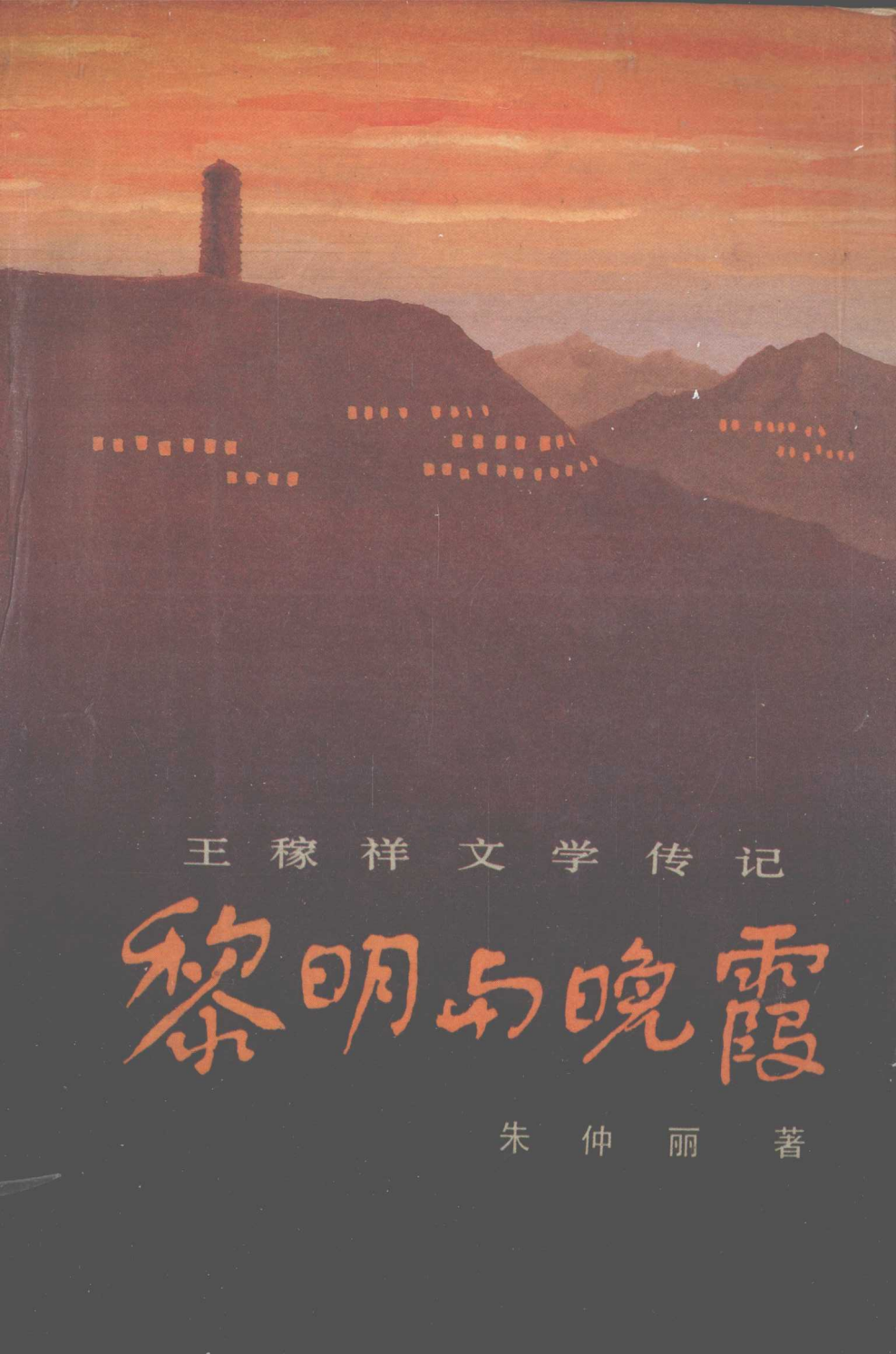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王稼祥文学传记

黎明与晚霞

朱仲丽 著

007759

王稼祥文学传记

黎明与晚霞

朱 仲 丽 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王稼祥文学传记

黎明与晚霞

朱仲丽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$14\frac{1}{8}$ 印张 310,000字

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12,000

统一书号: 10185·144 定价: (平)3.20元

(精)4.8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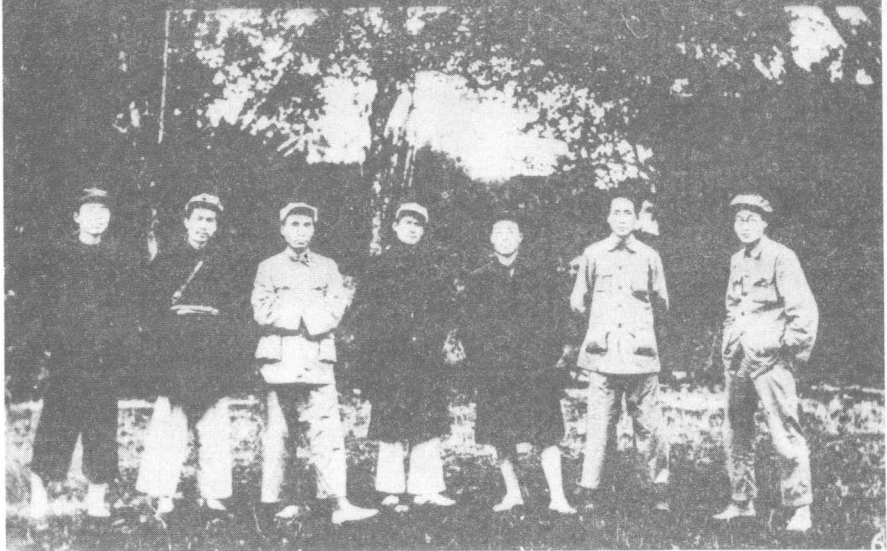
王稼祥（一九〇六年——一九七四年）



王稼祥与夫人、本书作者朱仲丽

(一九四二年在延安)

蘇區中央局委員攝於第一次全蘇大會紀念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
七於赤色



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（右起：王稼祥、毛泽东、项英、邓发、朱德、任弼时、顾作霖）



和毛泽东、肖劲光等与宁都起义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



一九三八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（从右至左，前：
王明、项英、朱德、王稼祥、毛泽东、康生，后：张闻天、
周恩来、刘少奇、彭德怀、博古、陈云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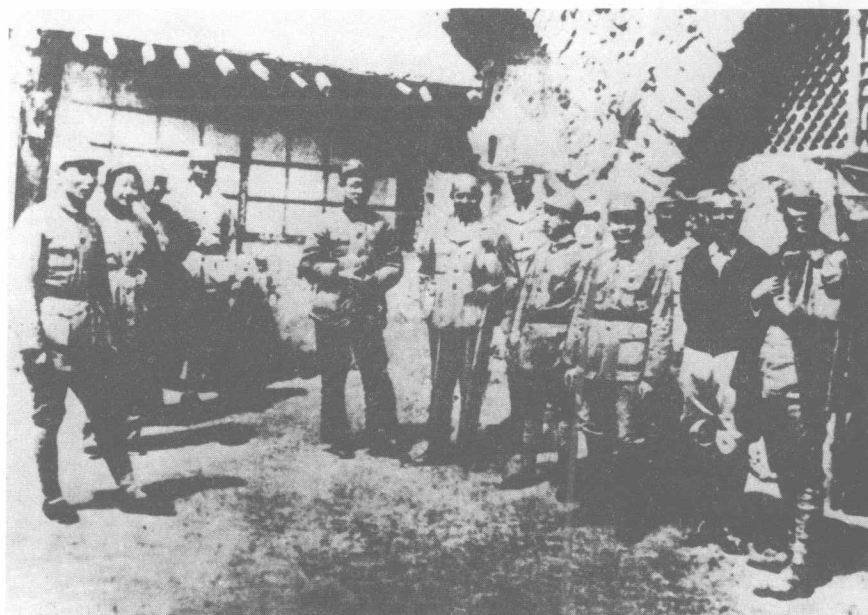
在延安与八路军干部交谈



一九四六年在苏联治病期间



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纪念会上讲话（一九四二年）



与印度援华医疗队合影（中：王稼祥、巴苏华、滕代远、谭政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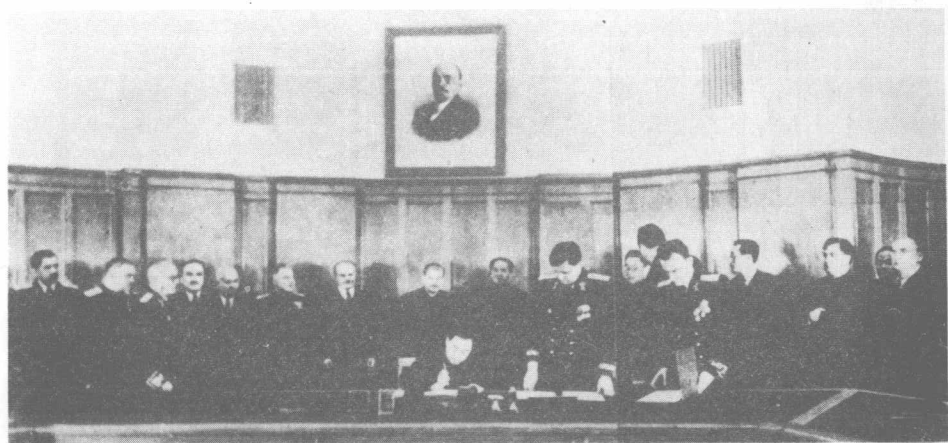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九四九年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与朱德交谈



一九五〇年与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亲切会见

一九五〇年一
月，陪同周恩来总
理瞻仰列宁墓



一九五〇年二月，毛泽东、斯大林和王稼祥等在中苏友好同盟
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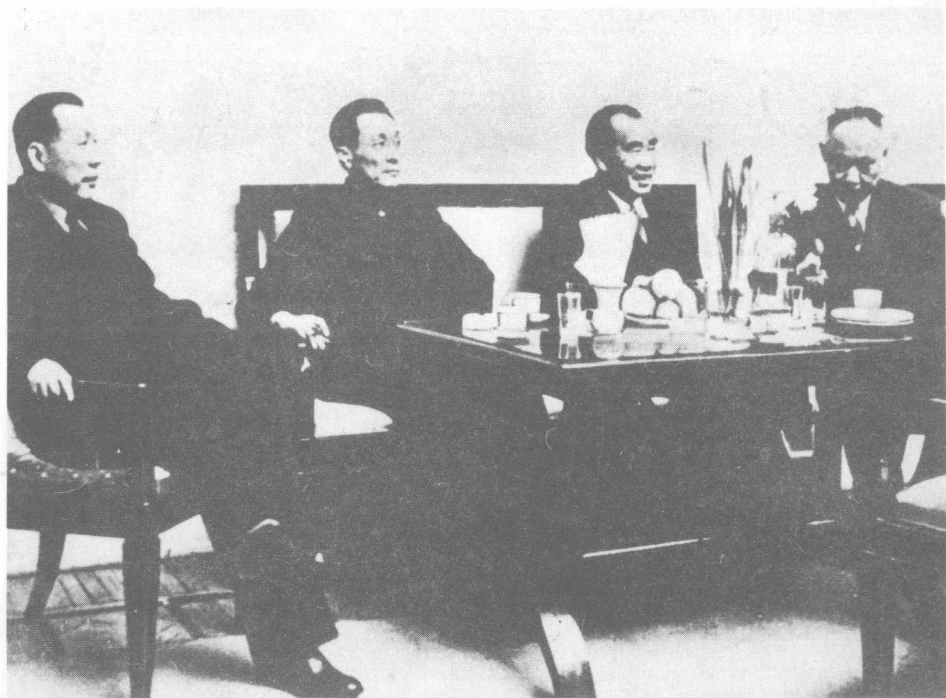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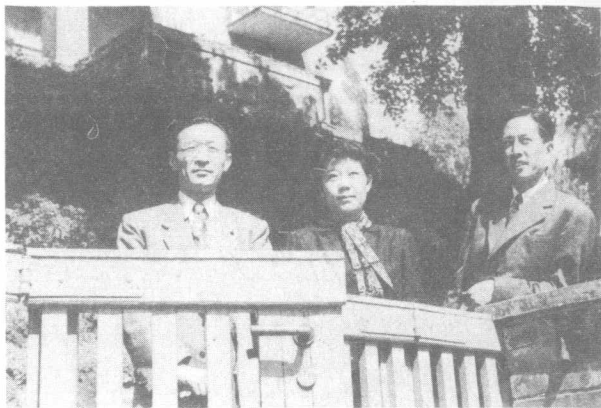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〇年在驻苏大使馆宴请苏联文艺界人士（前右起：
曹禺、丁玲、王稼祥，前左一：李伯钊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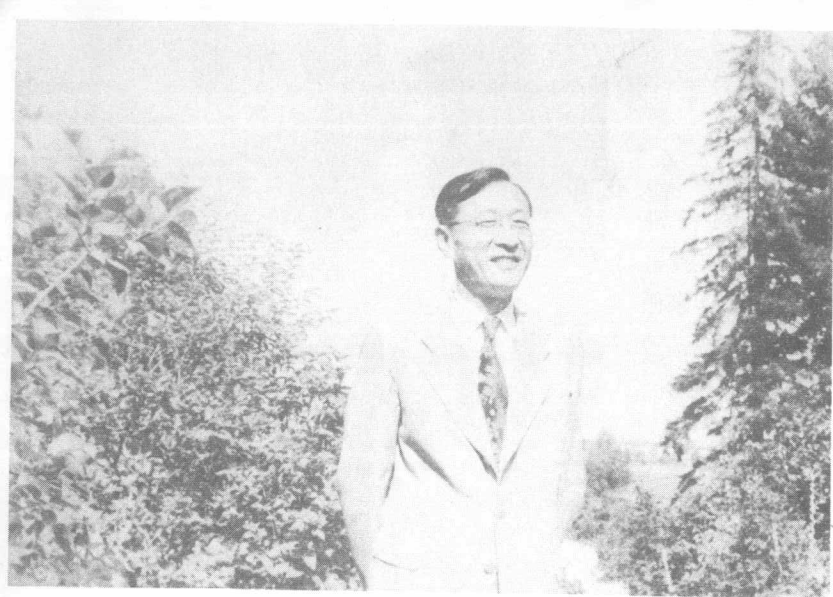
和刘少奇、陈云、邓小平、谭震林、杨尚昆等会见兄弟党代表团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一九五四年参加
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
(左起：王稼祥、朱仲
丽、华君武)



一九五九年参加波兰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（左起：
伍修权、王稼祥、朱德、王炳南）



一九六二年春天在上海



一九七三年在北京参加国庆游园活动

我所敬仰的王稼祥同志

——《黎明与晚霞》序

肖 华

我怀着崇敬、激动的心情，读了朱仲丽同志撰写的《黎明与晚霞》这部书稿，从她真实而生动的描写中，我们党和军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——王稼祥同志的光辉形象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五十多年前，我曾在王稼祥同志直接领导下，工作了一年左右。那是在一九三二年冬，中央红军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之前，王稼祥同志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、总政治部主任，我从红一军团调到总政治部任青年部长。直到一九三三年秋，我调到“少共国际师”，工作才离开他。这期间，我同王稼祥同志接触很多。从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，到此后几十年间对他的了解，使我最受教益、印象最深的，有这样几个方面。

王稼祥同志有很高的理论修养，坚强的党性，因而他能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，站在正确路线方面。他青年时期被党派往苏联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，获得了比较丰富的马列主义知识，奠定了革命理论的基础。一九三〇年回国，第二年春天来到江西中央苏区，年仅二十五岁，就担负起红军总政治

部主任的重任。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前后那些环境艰险、战斗频繁的日子里，只要稍有空闲，我们就看到他手不释卷地勤奋学习。正因为他有渊博的马列主义知识，又善于联系实际，独立思考，所以他到了中央根据地，经过一段观察了解后，就十分钦佩和尊重毛泽东同志，虚心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和丰富经验，使自己逐步摆脱了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，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方面。一九三五年一月，在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上，王稼祥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，投了“关键性的一票”，为实现转折发挥了重大作用。遵义会议后，他和周恩来同志被指定为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成员，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全军，胜利地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。一九四三年七月，王稼祥同志在延安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时，为纪念中共诞生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，发表了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》一文。文中写道：“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——过去，现在与未来——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，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导的道路。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，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，中国的共产主义。”他在这篇文章中，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初步论述了“毛泽东思想”这一科学概念。

王稼祥同志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，有着重大贡献。他在一九三一年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之后，把苏联红军的一整套政治工作经验介绍过来，逐步在红军中健全了政治工作机构，制订了比较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、条例和办法。《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（草案）》（有一个总则和十几个条例），就是由他主持制订在一九三二年颁发的。王稼祥同志在当时战争环境中，就卓

有远见地大力提倡学文化，号召干部、战士要掌握文化知识。他要宣传部召集部队的指导员开会，研究怎样教战士识字，怎样巩固学习效果。他还反复指示要讲纪律，要求干部都要以身作则，严格遵守纪律，吃苦耐劳，艰苦奋斗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，王稼祥同志和朱德、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同志一样，对部队的青年工作十分关怀。他多次强调红军战士多数是工农青年，必须把青年工作做好，才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。他对我说过：“没有青年就没有军队，没有坚强的青年工作就没有顽强的战斗力。”当时召开的有关青年工作会议，他都到会讲话。“四不五要三努力”的口号，也是经他审定后发出的。由于他和其他领导人的关怀与重视，当时部队的青年工作相当活跃，这对巩固部队，提高战斗力，都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
王稼祥同志有崇高的品德和优良的作风。凡是认识他了解他的，尤其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，都对他的这一特点留下难忘的印象。他谦虚谨慎，严肃认真，坚持原则，严守纪律，从不显露自己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兢兢业业，埋头工作，他勤奋学习，不断进取，善于调查研究，解决重大问题；他关怀爱护干部，待人公道正派，艰苦朴素，平易近人，看起来有些严肃，实际上满腔热情。他同严重的伤病长期作斗争的革命意志和顽强毅力，更是十分感人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一九三三年四月，中央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“围剿”的重大胜利后，为了庆祝胜利，进一步鼓舞部队的战斗情绪，总政治部在江西乐安县召开了全军青年工作会议。朱德总司令、周恩来政委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都参加了会议。正当周政委讲话时，突然飞来六架敌机，对作为会场的祠堂滥施轰炸。我和许多同志脱险了，王稼祥主任却不幸负

了重伤，弹片打穿了他的肠子，耳膜也被震破。在当时极为困难的医疗条件下，经过全力抢救和精心治疗，他才转危为安。但是，残留在他身上的弹片，却无法全部取出。因此，他的伤口经常发炎，发高烧，肠子流脓，有时皮管子掉进伤口。他就是以这样严重的伤病之躯，坚持跟随部队一道爬雪山，过草地，经历了异常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他这种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，顽强的革命毅力同伤病作斗争的精神，实在感人至极，也是一切伤病者应该学习的光辉榜样。

王稼祥同志的一生，是勤勤恳恳，光明磊落的一生，是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，为了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、鞠躬尽瘁的一生。这些，在《黎明与晚霞》一书中，都有比较翔实而生动的描绘。朱仲丽同志是稼祥同志的忠实伴侣，也是一位著名的医生，她近几年来在从事文学创作上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。她在这部新作出版前，嘱我作序。我在病中写了上面这些话，表示我对稼祥这位好领导，好师表的深切怀念！

王稼祥同志在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多了。他的历史功绩、革命精神、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，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，并激励着后人为四化建设努力奋进。

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日

于北京病中